



海外汉学丛书

中國文學に現われた
自然と自然観
中世文學を中心として

小尾郊一

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
自然与自然观

以魏晋南北朝文学为中心

〔日〕小尾郊一 著

邵毅平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文學に現われた
自然と自然觀

中世文學を中心として

小尾郊一

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
自然与自然观

以魏晋南北朝文学为中心

〔日〕小尾郊一 著

邵毅平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以魏晋南北朝文学为中心/[日]小尾郊一著;邵毅平译.—2版.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1

(海外汉学丛书)

ISBN 978-7-5325-7221-2

I. ①中… II. ①小… ②邵…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66148号



海外汉学丛书

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

——以魏晋南北朝文学为中心

[日]小尾郊一 著

邵毅平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21 $\frac{6}{18}$ 插页 3 字数 328,000

1989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2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

ISBN 978-7-5325-7221-2

I·2810 定价:58.00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出版说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直关注海外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就出版了《海外红学论集》、《金瓶梅西方论文集》等著作，并与科学出版社合作出版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先生主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80 年代后期，在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和海外著名汉学家的支持下，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了《海外汉学丛书》的出版计划，以集中展示海外汉学研究的成果。自 1989 年推出首批 4 种著作后，十年间这套丛书共推出 20 余种海外汉学名著，深受海内外学术界的好评。

《海外汉学丛书》包括来自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加拿大和俄罗斯等各国著名汉学家的研究著述，涉及中国哲学、历史、文学、宗教、民俗、经济、科技等诸多方面。提倡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和富于创见的研究精神，是其宗旨，也是这套丛书入选的标准。因此，丛书入选著作中既有不少已有定评的堪称经典之作，又有一些当时新出的汉学研究力作。前者如日本学者小尾郊一《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法国学者谢和耐的《中国和基督教》，后者以美国学者斯蒂芬·欧文（宇文所安）的《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为代表，这些著作虽然研究的角度和方法各有不同，但都对研究对象作了深入细微的考察和分析，体现出材料翔实和观点新颖的特点，为海内外学术界和知识界所借鉴。同时，译者也多为专业研究者，对原著多有心得之论，因此译本受到了海内外汉学界和读者的欢迎。

近十几年来，在中国研究的各个领域，中外学者的交流、对话日趋频繁而密切，中国学者对海外汉学成果的借鉴也日益及时而深入，海外汉学既是中国高校的独立研究专业，又成为中国学人育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取资对象。新生代的海外汉学家也从专为本国读者写作，自觉地扩

展到以华语阅读界为更广大的受众，其著作与中文学界相关著作开始出现话题互生共进的关系，预示了更广阔的学术谱系建立的可能。本世纪以来，虽然由于出版计划调整，《海外汉学丛书》一直未有新品推出，但上海古籍出版社仍然持续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海外汉学专题译丛，或从海外知名出版社直接引进汉学丛书如《剑桥中华文史丛刊》，积累了更为丰富的出版经验及资源。鉴于《海外汉学丛书》在海内外学术界曾产生过积极影响，上海古籍出版社听取学术界的意见，决定重新启动这套丛书，在推出新译的海外汉学名著的同时，也将部分已出版的重要海外汉学著作纳入这套丛书，集中品牌，以飨读者。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3月

中译本序一

1987年4月，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邵毅平先生与我联系，希望翻译及出版拙作《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以魏晋南北朝文学为中心》，并且说已经翻译了大半，杀青后打算作为《海外汉学丛书》的一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梓行，我即刻爽快地答应了。

杜甫诗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拙作自刊行以来，已经过了二十五年，现在其主旨也无大过，信而不疑。那时关于自然与自然观的著作，等于完全没有，坚信此书对于学界影响极大。此后，有关的论文陆续发表，受拙著之影响也未可知。拙作是一部研究中国文学的书，当然希望日本学者阅读，但倘若中国学者也能阅读的话，那更是求之不得、不胜欣喜的。

今年5月，我访问上海，有机会和邵先生晤面，言谈之下，知道他是一位温厚真挚的年轻研究者。我读了部分译稿，觉得译笔非常流畅，即便是原文中一些难解的地方，也能正确地译出，十分传神。

据说邵先生是章培恒教授的学生，同在一个研究所任职。他专攻中国古典文学，又谙识日语。1984年11月，复旦大学主办《文心雕龙》学术讨论会，日本学者的论文都译成中文，邵先生便是参加这项工作的一位。现在由钻研中国古典文学而精通日语的他来翻译拙作，我感到无比喜悦；而拙作能获得广大中国读者的赐阅，对于我的人生来说，更是万分荣幸的。

我对给予我这个机会的邵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小尾郊一

1987年11月15日于日本諏访

（原文用中文撰写）

中译本序二

小尾郊一博士的力作《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的中译本即将出版，这是值得欣幸的。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意识形态领域中出现了许多令人鼓舞的新气象。即以文学方面来说，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研究的进展就很迅速。然而，比较起来，古典文学研究所迈的步子似乎太小了一些。体现出新的特色和成就的论著当然不是没有，但远未形成一股气势磅礴的潮流，如同人们在现代文学研究中所看到的那样。很多的青年研究者对此感到不满，要求有所突破，我想，这是理当如此的吧！

要有所突破，首先自然应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以前的古典文学研究中所出现的种种弊病，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带来的，而是自称为马克思主义，但却从根本上违背、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所造成。那种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封闭性与保守性。它死抱着几条杜撰的、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所谓原则，顽固地拒绝、敌视一切新的东西。殊不知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善于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中的一切新的发现和发明作为自己的营养的。

也正因此，真要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指导古典文学的研究，绝不应抱残守阙，而要广泛地了解、有选择地吸收国外的新的理论和方法，从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中获得借鉴。这也正是目前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追求突破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其实，我们只要回想一下，近现代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作出巨大成绩的王国维、鲁迅等先辈，哪一个不曾吮吸过异域文化的乳汁？

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有其悠久的历史 and 远较西方各国有利的条件，其研究成果实在值得引起重视。至于其研究方法，既有与我们的传统方法相通之处，又蒙受西方的很大影响，其长处也甚明显。所以，介绍并翻译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论著，是这步骤中

十分重要的一环。而小尾博士的《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又是其中的上乘之作。

这部著作选择中国文学中涉及自然的作品进行综合的探讨，寻求出其变化发展的脉络。由于自然的描写本来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而魏晋南北朝文学与自然尤有密切的关系，这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魏晋南北朝文学与其他时代文学的异同、它在文学观念与艺术手法上的革新、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大贡献和地位。应该说，我们在这部书里所看到的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这一切，跟我们在最近三十几年来所形成的有关观念颇有距离。孰是孰非，自非一言能决；但书中的许多看法，至少在我看来，是可以引发对问题的新的思考，富于借鉴意义的。

而且，由于从某种意义上说，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于中国文学传统的主流是一种特异的存在，它自唐宋以来经常受到批判。本书在引发我们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新的思考的同时，通过魏晋南北朝文学与其他时期文学的对比，在若干方面必然还可以引起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总体的新的思考。

至于本书所用的研究方法，也可使我们获得许多启发。就其重视材料的掌握来看，跟我国的朴学的传统当然有相通之处；不过，它力求从多种角度提供大量的材料，按照我们当前的习惯，有的甚至似乎达到了繁琐的程度，这却是根据今天的认识水平，对事物本身的复杂性有了周密的考虑的结果。换言之，存在于这种方法的根底里的，乃是一种现代的科学观念，而不是古代朴学的那种素朴的——虽然在当时来说也称得上是科学的——观念。而且，我国的这种传统的方法一般用于具体事件的考证，而本书则用于考察观念、感情、艺术方法的变迁，这更不是我国朴学的传统所能囿。另一方面，本书处处使用了比较的方法，无论是论述一个时期或一个作家的文学上的特点与成就，都通过比较而得出结论，这较之预先拟定某种标准，视其是否相合而判断优劣，自然也远为科学。而这种比较的方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在我国的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却是不多见的。

不过，较之研究方法更值得注意的，乃是渗透于全书的文学观念。此书的写定，是在1962年。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当时对文学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还很少有人作专门的研究。那么，作者为什么选择这一课题，而且作出了这样使人趣味盎然的研究呢？是一种什么观念在支配着他？通读全书，我们会对这种观念获得深刻的印象。当然，文学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之一，然而，这里的所谓“决定”是什么意思呢？具体到人对于自然的观赏来说，人在观赏自然时的思想感情当然不能不受其所处的那个特定的经济基础的制约，也即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然而，当时的思想感情却仍然是由自然所引发而不是由经济基础所引发。这样，不同时代的人在观赏自然时的思想感情，固然有其由于经济基础的不同而相异的一面，也可能有其由于人与自然的这种特定关系而产生的类似或共通之处。因此对于文学与经济基础的关系的过于狭隘的理解恐怕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在文学观念上开扩视野似乎也是当务之急，从而渗透在本书中的文学观念对于读者大概也会有相当的吸引力。

所以，小尾博士的这部力作至少对于中国的同行是颇有意义的，而邵毅平同志的译笔又足以副之，这也就是我对这部书的中译本的出版深为欣幸的原因。而且，我相信，在认真阅读以后，一定会有不少读者产生跟我相类的感想吧！

章培恒

1987年12月11日

中译本序三

20 世纪日本的中国六朝文学研究（在日本也称“中国中世文学研究”），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为分界线，大致上可以分为战前与战后两个时期。战前时期，是日本的中国六朝文学研究的低潮时期，四十余年间仅出现了八十余种研究论著，而且还局限于东京和京都两地。究其原因，乃是因为尽管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不断吸收西方近代文化，但在中国文学的研究方面，尤其是在中国六朝文学的研究方面，却仍然受到以经学为中心的传统的汉文学价值观的束缚，对未能“文以载道”的六朝文学有着看轻的倾向；同时，也往往只是把中国的古典作为与日本本国文化相同的东西来看待（这就是所谓的“国汉”思想），而不是把六朝文学当作外国文学来作近代意义的研究。但是，即使在这一时期，也不是没有新风在吹拂的。早在 1911 年，铃木虎雄就以其《山水文学与谢灵运》（后收入其《支那文学研究》），而显示了六朝文学研究的新方向。后来，青木正儿有《支那人的自然观》（后收入其《支那文学艺术考》），对中国文学中的自然观作了探讨。1934 年，桥本循发表《支那文学与山水思想》（载《立命馆文学》），开始更为仔细地探讨谢灵运的山水文学。与此同时，《世说新语》等作品的文学性，也开始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出现了一系列的研究论著。这是吹拂于战前日本的中国六朝文学研究界的新风，它已经预示了战后日本的中国六朝文学研究的大致走向。

战后最初几年，日本经济混乱，社会动荡，生活困难。当时日本的中国六朝文学研究，也像学术界的其他领域一样，除了零星的点缀之外，大致上是一片空白。进入 1950 年代，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和日美关系的改善，带来了经济复兴，社会繁荣，生活上升，这奠定了学术研究得以重新开展的物质基础。其次，日本战败以后类似国际社会局外人的地位，给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者以深深的刺激，使他们普遍产生了萨特式的“没有出路”的感觉。这种精神

状态，拉近了他们与具有类似倾向的中国六朝文学的距离，使许多人因此而转向了中国六朝文学研究。对于青春伤痕甚深的新一代学者来说，中国六朝文学研究不仅仅是一门学问，而且也是心灵的感应与共鸣。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了战后日本的中国六朝文学研究的中坚。再次，1950年代初，日本的旧制大学普遍改为新制大学，各个新制大学相继出版了自己的纪要和研究会的机关杂志，再加上1950年创刊的日本中国学会的《日本中国学会报》、1954年创刊的京都大学的《中国文学报》、1961年创刊的广岛大学的《中国中世文学研究》等中国文学的专门杂志，形成了全国性的中国文学的研究刊物网络，改变了战前研究力量仅局限于东京和京都两地的局面，为各地研究中国六朝文学的学者提供了长期而稳定的发表研究成果的阵地，促进了大批研究论著的出现和新一代学者的成长。最后，随着战后日本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它受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深，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距离则越来越远，再加上战前即已吹拂于日本的中国六朝文学研究界的新风的影响，因此而带来了战后日本的中国六朝文学研究的价值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改变，这对于开拓研究领域和拓展学术视野无疑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由于上述几方面重要因素的综合作用，战后日本的中国六朝文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成为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的最重要的一翼。据《中国文学研究文献要览（1945—1977战后编）》的“三国六朝文学”部分统计，在战后1945年至1977年的三十来年间，就出现了近千种研究论著，与战前四十余年间仅出现八十余种论著的情况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同时，战后日本的中国六朝文学研究的范围也非常广泛，涉及几乎所有的重要著作、作家和领域，其中尤以对于《文选》、《玉台新咏》、《诗品》、《文心雕龙》、《世说新语》等著作，曹植、阮籍、嵇康、陶渊明、谢灵运、庾信等作家的研究成就最为突出。在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的基础上，涌现出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专著，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当推斯波六郎的《文选索引》（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9）、网祐次的《中国中世文学研究》（东京，新树社，1960）、小尾郊一的《中国文学中所表现

的自然与自然观》（东京，岩波书店，1962）、铃木修次的《汉魏诗研究》（东京，大修馆书店，1967）、增田清秀的《乐府的历史研究》（东京，创文社，1975）、林田慎之助的《中国中世文学批评史》（东京，创文社，1977），等等，它们标志着战后日本的中国六朝文学研究的水准。^①

在战后日本的中国六朝文学研究界，小尾郊一博士是中坚之一；他的《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一书，则是这个领域中的重要成果之一。小尾郊一博士，1913年2月2日生于日本长野县茅野市。1938年进入广岛文理科大学（今广岛大学前身）文学科学习汉文学，1941年毕业。此后历任京都的东方文化研究所（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前身）助手，广岛文理科大学讲师，广岛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广岛大学文学部助教授、教授，武库川女子大学教授等职，现任日本中国学会名誉会员、东方学会评议员、广岛大学名誉教授。小尾郊一博士在京都的东方文化研究所时，曾从事吉川幸次郎主持的《毛诗正义》的校定事业；后来又曾在广岛高等师范学校讲授《传习录》、《近思录》、《古诗源》等中国古典著作；他早年的论著，有《全唐诗作者索引》（与长尾伴七合编，1941）、《关于毛诗正义的论证的一个考察》（1945）、《白氏文集的传本》（1946）、斯波六郎著《陶渊明诗译注》书评（1948）等。从小尾郊一博士早期所从事的工作、所讲授的课程和所发表的论文来看，可以说他当时大抵尚处于传统的以经学为中心的研究方法的影响之下。但是，作为一个感受到时代风气之巨变的战后新一代学者，小尾郊一博士也开始致力于新的研究方向的探求。正如他自己在《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的《后记》中所说的，当他讲授《古诗源》中谢灵运和陶渊明的诗时，感到这才是真正的文学；同时又受到了铃木虎雄的论文《山水文学与谢灵运》的启发，于是终于以《谢灵运与自然》（1950）为嚆矢，迈出了他自己的——同时也是战后日本的——中国六朝

① 以上介绍，参考了松本幸男《日本的中国中世文学研究八十年》（载《立命馆文学》第422—423号，1980年8—9月）一文观点和资料，谨此说明，并申谢意。

文学研究的重要一步，继承并发展了从自然与自然观的角度研究中国六朝文学的传统。此后的十来年间，他先后写出了《六朝赏字用例》（1953）、《论招隐诗》（1954）、《兰亭诗考》（1955）、《论作为山水游记的水经注及宜都山川记》（1956）、《六朝的游记》（1957）、《魏晋文学中所表现的悲秋及其产生》（1958）、《六朝文学中所表现的山水观》（1958）、《左思的赋观——魏晋赋中的写实精神》（1959）等多篇重要论文，或从人们所习见的材料中找出新的意义，或从新的角度去看为人们所忽视的材料，或宏观地探讨一个时代的自然观，或微观地考察一个词的意义变迁，总之，它们都是以新的眼光来研究中国六朝文学的。这些论文，构成了《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一书的骨架。1957年，小尾郊一博士以此书（雏形）获得以广岛文理科大学名义授予的文学博士学位。1962年，此书由岩波书店出版。此书问世后，受到日本学术界的好评。立命馆大学教授高木正一在《立命馆文学》第214号（1963年4月）上发表书评指出：“著者涉猎了现存的众多的当时文献，并以从中搜集到的大量资料及对于这些资料的绵密考察为基础，展开了非常翔实的论述……此书所阐明的许多新的事实，不仅会给予中国文学的研究者，而且也会给予研究日本文学和西洋文学的人们以各种有益的启示。”京都大学笈文生在《中国文学报》第19册（1963年10月）上也发表书评予以善评。立命馆大学教授松本幸男的《日本的中国中世文学研究八十年》，则将此书看作是战后日本的中国六朝文学研究的“代表性业绩”之一。至1982年，此书已第四次印刷，由此也可见其在日本学术界受重视和欢迎之程度。

继此书之后，小尾郊一博士在从事授课任务和担任社会工作之余，继续潜心研究，笔耕不辍，又完成了许多重要的论著。其中专著有《文选》日译本五册（东京，集英社，1974—1976）、《玉台新咏索引》（与高志真夫合编，1976）、《李白》（东京，集英社，1982）、《谢灵运》（东京，汲古书院，1983）、《杨贵妃》（东京，集英社，1986）、《中国的隐遁思想》（东京，中央公论社，1988）等，论文有《丛书堂钞本嵇康集》

(1960)、《沈休文集考证》(1961)、《楚辞王逸注的兴》(1962)、《柳冕的文论》(1962)、《论馨字》(1963)、《庾信其人与文学》(1964)、《谢灵运的初去郡诗》(1965)、《艳歌与艳》(1965)、《文选李善注引书考证》(1966)、《昭明太子的文学论》(1967)、《谢灵运的山水诗》(1968)、《陆机文赋的意味》(1968)、《齐梁文学与自然》(1973)、《严铁桥全齐梁文补遗》(1973)、《汉赋的娱乐性——问答体与架空人物》(1975)、《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人生》(1976)、《天·地·人》(1980)、《真与美的发现——关于陶渊明与谢灵运》(1982)、《论文心雕龙物色篇及齐梁文学的自然观》(1985)、《刘峻的辩命论》(1986)、《归去来辞的意图》(1987)等。从这些论著也可以看出,小尾郊一博士一直在孜孜不倦地从事中国六朝文学的研究。此外,还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小尾郊一博士自1961年至1976年间,曾长期主持战后日本的中国六朝文学研究的重要刊物之一《中国中世文学研究》的编辑工作,为建设广岛大学的中国六朝文学研究的阵地,从而也为整个日本的中国六朝文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说起来,我之所以要翻译小尾郊一博士的《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一书,不仅是由于此书是战后日本的中国六朝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而且也是由于此书对于我们中国的六朝文学研究的发展可能具有的相当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对于六朝文学的评价是比较低的,究其原因,其实也正是由于以经学为中心的传统的文学价值观在背后隐隐地起作用。按照传统的“文以载道”的文学价值观看来,或者说按照“文以载道”化了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价值观看来,六朝文学由于较多吟咏花鸟风月与山水自然,较少反映社会矛盾与民生疾苦,所以不是好的文学。这样一种观点,与战前日本的中国六朝文学的价值观颇有相似之处。由于受这样一种观点的支配,所以中国的六朝文学研究发展速度比较迟缓,在若干方面,明显落后于战后日本的中国六朝文学研究。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中国的六朝文学研究也正在酝酿着变革,六朝文学中所表现的人的自我意识和审美意识的觉醒,以

及由此带来的内容与技巧的进步，正在日益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前不久发表的章培恒先生的长篇论文《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载《复旦学报》1987年第1期），便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信号。在这样的情况下，将从自然与自然观角度研究六朝文学的小尾郊一博士的这部著作介绍给中国学术界，我想是很有必要的。相信小尾郊一博士此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将会给予正在变革中的中国的六朝文学研究以新鲜的刺激和有益的启示。

邵毅平

1987年10月识于复旦大学

序

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文学与自然之间都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在中国，这种关系更为紧密。这么说绝非过言：自古以来，中国文学很少不谈到自然的，中国文人极少不歌唱自然的。纵观整个中国文学，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人认为只有在自然中，才有安居之地；只有在自然中，才存在着真正的美。

此书以文学与自然的关系尤为密切的魏晋南北朝文学为中心，旨在阐明下列问题：当时的文学中描写了怎样的自然？为什么会开始描写那种自然？还有，当时的人们是怎样看待那种自然的？等等。

南朝时代，更是一个歌唱自然的时代。南朝文学中的自然主要是山水。此外，这个时代还是审美性的自然观确立的时代。本书第一章就这种南朝文学被导出以前的魏晋文学探讨了南朝文学产生的原因和过程，而且，还对把山水看作是隐遁之地和游玩之地的自然观的确立作了阐述。

第二章主要从若干方面探讨了吟咏山水的南朝文学，而且对把山水作为审美对象来眺望的自然观的发展作了阐述。其中提到了游记文学，注意到了历来不被看作是文学作品的地志类作品，并灵活运用。我想，这样做多少还是有点意义的吧！

以上二章是本书的中心。序章则上溯到《诗经》、楚辞，概观了其中的自然描写；第三章则考察了北朝文学中的自然；在结语中，又概观了自唐代至清代的写景文学。

此书虽然以“自然与自然观”为标题，但其实是以山水与山水观为主的。当然，把这之外的风云月露、花草禽兽之类自然现象和自然物作为中心来考察，也完全是必要的，但在此书中却不能顾及了。

承蒙各方面的指教和厚意，此书始得以有成。其中，已故的斯波六

郎先生^①曾赐予特殊的指导，但非常遗憾的是，他生前却未能看到此书的出版。此外，吉川幸次郎博士^②除赐教之外，还在出版方面予以帮助，并为此书题签。平冈武夫教授^③则对此书的刊行惠予种种支援。在此，我谨向诸位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小尾郊一

1962年1月15日

① 斯波六郎（1894—1959），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前广岛大学名誉教授。主要著作有《文选索引》、《文选李善注所引尚书考证》、《文心雕龙札记》（未完）等。——译者注

② 吉川幸次郎（1904—1980），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前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主要著作有《元杂剧研究》、《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等。——译者注

③ 平冈武夫（1909—1995），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前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主要著作有《校定白氏文集》、《唐代的散文作家》、《唐代的诗人》、《李白的作品》等。——译者注